

【新闻与传播】

知识视野与方案思维:建设性新闻理念下健康传播策略探索^{*}

陈 薇 施瑞鑫

摘 要:在去中心化的传播语境下,健康传播既面临着健康知识权威性降低的窘境,也经历着传播主体信任资本瓦解的困局。建设性新闻立足于知识的科学性和专业性,通过整合多元知识实现新闻范式的严谨可证与辩证平衡,探寻将知识转化为可行方案的解决之道。这种兼具知识视野与方案思维的新闻范式,与健康传播的“知信行”此呼彼应,建设性新闻通过知识建构者、动力激发者和行动促进者三重身份,勾连成具有建设性力量的知识链条,以情理逻辑呈现多元知识、以辩证平衡架构完整叙事、以积极介入寻求共谋共建,是优化健康传播策略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知识型新闻;健康传播;知信行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7-0166-07

媒介技术的变革降低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准入门槛,也重塑了新闻业的权威性与合法性。^①建设性新闻主张广泛分享,在坚守新闻伦理和核心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倡导积极的心理技巧,增强公众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激发他们傅纳以言、赋能于世的想法与行为。^②从这个意义来说,建设性新闻立足于知识的科学性和专业性,通过整合多元知识实现新闻范式的严谨可证与辩证平衡,探寻将知识转化为可行方案的解决之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互影响下,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公共卫生与健康传播成为全民关注的重大课题。健康传播的核心是健康知识的传播,其目的在于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促使人们采取有益身心健康的行动,减少影响健康的消极因素。^③而健康传播在新闻业的开拓与深耕,体认了知识型新闻的内在机理和延展空间。因此,建设性新闻成为“健康传播接受新媒体时代科学检验和民主训练”的因应策略。^④目前学界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多集中于理念阐述、范式辨析和中西对比等

理论层面,对于建设性新闻如何作用于具体的新闻实践和特定的传播领域,尚待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将建设性新闻视作一种知识型新闻范畴,基于健康传播与建设性新闻内在的逻辑勾连,建构健康传播的实践路径。

一、建设性新闻:以知识为基,提解决之道

作为一项新媒介生态下颇受瞩目的新闻改革运动,建设性新闻在新闻实践的迭代与转型中破土而出,又经学界的追根溯源和理论哺育蓬勃生长。与传统的新闻专业理念不同,建设性新闻强调在忠于新闻核心价值的基础上,通过鼓舞人心的叙述对社会问题主动地介入。这种介入体现在新闻从业者以全景式的专业视野审视现实世界和社会病灶,通过宏观的新闻生产机制设计和微观层面的平衡式叙事策略^⑤,寻找可转化为行动的观点资源并提出解决方案。因此,这种范式革新既是西方新闻业在探索对抗消极叙事的一种尝试,也是在技术驱动下对传统新闻边界的一种延展和补充。

建设性新闻所强调的介入性并非“师出无名”。

收稿日期:2020-12-16

^{*} 基金项目: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专项基金;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前沿青年团队支持计划。

作者简介:陈薇,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4)。

施瑞鑫,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生(武汉 430074)。

一方面,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批判性报道的兴起,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一部分矫枉过正的批判性报道将冷漠与偏见的世界观传递给了社会公众,助长了新闻报道的负面倾向,日益透支了受众对媒体的信任。^⑥另一方面,以时效性为基本价值的新闻生产,囿于效益当道的市场逻辑,缺乏对某一事件或现象的长期性、全景式的描绘与解释。随着智媒技术下信息价值的“内卷”与“后真相”时代情感价值的“外溢”,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与伦理价值也遭受挑战,加剧了工具理性的滥觞与人本精神的衰弱。^⑦因此,新闻业亟须超越对报道对象浅层、简化与煽情夸张的描绘或批判,利用自身的知识张力回应问题,并提出科学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区别于传统新闻实践和新闻理念,引入积极心理学和提出解决之道是建设性新闻在方法论上的核心价值,这也呼应了“建设性”一词强调的面向——积极与改善^⑧。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新闻系通过将现有的建设性新闻教学方法和行业内建设性新闻的应用相结合,提出了包括解决方案(solutions)、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包容性与多样性(inclusiveness and diversity)、赋权于民(empower people)、解释性报道(explain the news and give context)以及协同创作(co-creation)的六大要素作为其实践准则。^⑨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既是建设性新闻的必要条件,也是达成途径与目标旨归。一方面,知识构成了社会交流和共同行动的基础,科学的解决方案有赖于经过系统性验证的知识为支撑;另一方面,回归到新闻的基本价值,解决方案不是为了服从于正面叙事的基调,而是创造更为丰富的知识与更广阔的话语空间。^⑩

事实上,新闻具有知识性这一理念早已被帕克、帕特森、唐斯巴赫等学者阐发。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将知识分为熟识型知识和理解型知识两类,前者侧重现象的描述,后者则关注观念的解释与论证过程。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认为,这两类知识构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知识谱系。^⑪传统的“信息模式”新闻更偏向于“熟识型知识”,以呈现片段的事实和孤立事件为主,描述那些意料之外又合乎常理的事件,而在探究被遮蔽的事实以及事实与事实、事件与事件之间逻辑联系等“理解型知识”上,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形式逐渐为社会所认可并进入主流新闻话语中,同时满足受众的信息实用

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⑫

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帕特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型新闻”这一概念。他认为,知识型新闻是一种“超越了传统直接观察、实验访谈,致力于系统性证明和解释”的形式^⑬,主张新闻从业者不应该像通才,而应该像医生、律师或其他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在保持新闻基本要素的同时,还要将新闻报道的内容同非专业信息区别开来。^⑭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唐斯巴赫延续了帕特森的思路,他认为记者应是一种“知识职业”,用来补充图书管理员和教育工作者存储和传播知识的职能。在互联网时代,面对信息垄断的打破和学校教育的扩展,“熟识型”记者很难适应新闻业作为“新知识专业”变化的需求。因此,唐斯巴赫呼吁记者拓展自身的综合能力、专业能力、流程能力、新闻技巧和职业价值观。^⑮其中,综合能力和专业能力是知识谱系中更具“理解”性的向度发展因素。在这一转变下,记者的职业边界也重新得以明确,美国东北大学传播学教授马修·尼斯贝将其概述为知识经纪人(knowledge broker)、对话经纪人(dialogue broker)和政策经纪人(policy broker)三种类型。其中,作为知识经纪人的记者向公众呈现专业的知识生产和应用过程,考察科学研究的方式和原理,他们不仅描述和解释知识,还通过提供新的思路和论证来促成新知的生成;作为对话经纪人的记者善于使用不同的社交媒体工具,在知识生产者和公众多元并存的网络环境中创造讨论的平台;作为政策经纪人的记者则通过新闻报道扩大公众和各类组织进行决策的范围。^⑯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基于知识的新闻(knowledge-based journalism),试图突破新闻报道在复杂性和专业性问题上的局限,向公众解释事件与现象的前因后果,推动弥合分歧的讨论,评估社会与个人所能采取的行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由此在“熟识”的基础上协助公众进一步“理解”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⑰进一步而言,建设性新闻的“知识性”体现在其深度、广度和时空跨度上:其一,强调记者对与报道主题相关知识的钻研和思考,通过深入挖掘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 and 行动;其二,以多样性的知识生产丰富公众的见识,提升公众对社会变革和公共事务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其三,强调在断裂的、原子化的现实世界,为公众提供一幅逻辑清晰、尽可能包含全貌的认知图景,启迪他们回望历史、反思当下并展

望未来。由此,建设性新闻旨在提供与议题密切相关的、专业性的信息和科学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更广阔的知识视角与话语方式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产品,以观往知来的智慧回馈社会。

二、基于知识的健康传播:建设性新闻的“知信行”

如前所述,基于知识的新闻既是新闻从业者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公共事务报道的方式,也是一种影响和协同公众参与社会行动的价值选择。这与健康传播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健康传播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促使人们采取有益身心健康的行动。传播内容不仅关涉疾病科普、医疗保健等生理议题,还包括医疗制度、公共卫生、医患关系等与社会关系相关的非生理议题。但无论是哪个面向,都需要围绕特定的健康知识对传播对象做出专业的、科学的描述和评估,并提出有据可依的解决策略。新闻报道作为知识权威的重要载体,在健康传播的知识普及化、操作化上有着不可比拟的地位。然而,在“去中心化”的传播语境下,传播者医学知识的匮乏和效益为先的传播环境加重了健康传播中知识权威的衰微,而一部分缺乏伦理监管的传播策略也弱化了健康传播的行动感召力。

健康传播的“知信行模型”(Knowledge, Attitude, Belief/Practice, 简称 KAP/KABP)较为系统地概括了该领域信息传播的逻辑。^⑧这一理论模型认为,在知识、态度、行为三个连续体中,健康知识是人们形成积极、正确的健康信念和态度的基础,而正确的健康信念和态度则是行为改变的动力。^⑨这与建设性新闻所包含的解决方案、未来导向、包容性与多样性、赋权于民、解释性报道、协同创作等要素具有内在一致性。循着这一逻辑,建设性新闻可为健康传播提供一种理念和实践上的启示,通过整合知识权威和传播技巧,勾连成具有建设性力量的知识链条,将健康知识转化为易行的、可操作的行动策略。

1. 知识建构者:以科学性巩固健康传播的合法性

科学性既是健康传播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建设性新闻实践的关键所在。媒介技术的演进催生出新传播形态,拓宽了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健康观念交流对话,但也有可能影响健康传播的实效。传播主体的泛化打破了专家和媒体对知识资源和传播权力的占有,也缔造了许多打着健康旗号

的“伪专家”和“伪学说”,助长了帕克所说的谣言这一“与新闻相关,但可信度更低的知识类型”的滋生和传播。同时,在紧追时效的市场化运作下,不乏未经验证就匆忙发布信息或选择性强调和忽略部分信息现象,这都影响了健康传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涉及健康知识的新闻,既要求新闻从业者具备新闻传播的素养,也需要他们掌握公共卫生、基础医学、社会学、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知识。新闻从业者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给健康传播以建设性力量:其一,专业知识的储备帮助新闻从业者对健康信息进行初步筛选和判断,确定符合报道议题的采访对象,识别所采编素材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其二,有助于锻炼新闻从业者的科学思维,对科研结论和医学成果予以批判性思考,以确保知识和观点的科学性和有用性;其三,健康数据的准确呈现和解读离不开专业知识的积累,而对新闻背景和语境的全景式阐述也需要专业知识保驾护航。

2. 动力激发者:以严谨性增进公众的自我效能感

恐惧诉求是健康传播常用的传播策略,以呈现带有威胁性的负面信息诱发个体的恐惧,从而激发其接受传播的劝服信息。^⑩其理论模型为拓展的平行过程模型(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这个理论概括了公众应对恐惧诉求信息开启的评估方式。当公众感知到威胁时,就会开启感知效能(perceived efficacy)评估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如果公众认为推荐的预防措施有效并能成功实施,就会进入“危险控制”(danger control)程序,即采纳建议的预防措施;反之,则会进入“恐惧控制”(fear control)程序,即抗拒此类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预防措施。^⑪前者促成了健康传播效果的达成,后者则会导致公众对健康知识的漠视甚至抗拒。然而在健康传播实践中,第二种恐惧诉求的策略颇有市场。有学者通过对登革热报道的叙事方式进行实验性研究,发现虽然悲伤的故事能增加公众对疾病的易感性,却不能激发他们采取对策的意图。相反,人们往往更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与恢复和成长有关的积极的体验。^⑫因此,将更具建设性的积极心理学引进健康传播,注入更多正向与充满希望的元素,相较于恐怖诉求而言或许效果更优。这并不意味着健康传播放弃恐惧诉求的效用,而是在对健康知识严谨把关的基础上,呈现正负兼具、客观平衡的健康知识,为处于

信息焦虑和情绪恐慌的公众提供翔实可靠的资讯。同时,建设性新闻的未来导向着力于可能达成的目标,能够减少公众面对复杂信息不确定性的焦虑,增加公众对不良健康后果的产生原因、影响以及如何寻求信息和帮助等方面的认知和理解。这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判断,前提是记者谨慎地处理数据和信息,尽量避免使用夸张的、非理性的标题和表述,避免给经受不确定性困扰的公众带来虚假的希望。

3.行动促进者:以思辨性启发公众思考解决之道

在动员公众健康行为向善发展上,建设性新闻主要采取两种途径。第一种是直接介入途径,媒体通过告知、激励和引导个人来促进改变。尽管科学本身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充满着不确定性,但科学家、公众和媒体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不尽相同。在科学家看来,不确定性是科学的一个正常也是必需的特征,但公众则认为不确定性削弱了科学的权威性。记者对此的共识是,虽然不确定性影响了科学家与公众及社会之间的关系,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决策边界,因此应将这种不确定性与

风险告诉公众和决策者。^{②3}建设性新闻的方案导向就聚焦于将健康知识转化为行动方案,即比告知不确定性和风险更进一步,提出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策略,为公众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动提供参考。在一些重要的卫生事件中,建设性新闻的介入性表现得更为直接,新闻媒体甚至作为主要行动者参与问题讨论和解决。

第二种是社会中介途径,媒体可以在健康传播的不同主体之间发挥中介和联结作用。健康知识更多的是一种科学型知识,常常伴有争议性甚至是两极分化的争论,因此,具有建设性的健康传播除了让公众更深入地理解健康研究的方法和原因,阐明产生相关结论的条件和假设外,还需要利用社交媒体促进专家、政府、意见领袖和公众的对话与合作,启发各方共同思考更多的替代性方案。

由此,基于健康传播与建设性新闻的内在逻辑勾连,可以建构健康传播的建设性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建设性新闻的六大要素贯穿于健康传播的“知信行”路径,分别在不同环节扮演着主导角色(见表1)。

表1 健康传播的建设性模型框架

建设性新闻六大要素	要素意涵	对应的“知信行”模型维度
解释性报道	使用数据创建清晰的信息图表,通过提供语境和背景、挖掘深层次原因来解释新闻	知识:巧用传播技巧,将科学严谨的健康知识变得生动易懂
协同创作	与公众共同创造内容	知识:通过公众的自发探讨和专家、媒体的积极引导,为健康议题补充日常生活层面的经验性知识
未来导向	在新闻的5W要素之后对现状如何进行追问,聚焦未来趋势和实现方案	信念:以可操作的方案增强公众采取健康行为的信念感和效能感
包容性与多样性	在报道中增加更多元的声音和观点,以对抗“极化”现象	态度:以辩证平衡的报道减少公众对健康知识盲区的过度恐慌或盲目乐观
解决方案	在揭示问题的同时添加面向解决方案的报道框架	行为:阐明可借鉴的传播方案,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行动指南
赋权于民	广泛了解公众意见,寻求可能的对话、合作和解决方案	行为:联结多方协作,促进有利于健康生活的政策制定和行动落实

就知识维度来看,“解释性报道”和“协同创作”原则有助于从现象到背景、从内容到形式、从专业到日常丰富健康知识的内容层次,扩展健康传播的主体对象与目标受众;就态度信念维度来看,“未来导向”和“包容性与多样性”原则旨在制定面向未来的方案,以增强公众采取健康行为的信念与效能,并通过多元的声音缓解公众的极端化情绪;就行为维度来看,“解决方案”和“赋权于民”原则旨在面向公众阐明行之有效的健康传播方案,帮助公众探寻健康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并通过多方的参与来促进

行为的落地实施。值得一提的是,建设性新闻的各要素与“知信行”维度之间并非僵化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在健康传播的不同阶段多元并举、各有侧重。例如,在健康知识传递环节,不仅需要通过解释性报道完善知识的来龙去脉与所处语境,也需要通过赋权于民的报道方式,提升知识的普及率,强化行为参与。

有鉴于此,对健康传播而言,建设性新闻不失为他山之石,在多个层面创造了知识、信念和行动互动的空间。然而,建设性元素中的协同创作在

“知识型新闻”的应用中尚有局限,因为健康知识属于科学严谨的真理性知识,存在较为宽厚的认知壁垒与理解屏障,公众也更容易被吸纳进专业知识之外的浅层言论空间。

三、健康传播的建设性逻辑与实践策略

上述框架为建设性新闻理念下的健康传播提供了一种规范性的思考方式。由此,建设性新闻理念不仅将健康传播引向更广阔的知识视野,而且以方案思维促成政策协商和实际行动,不失为在“去中心化”的传播语境下一种优化健康传播实践的探索性策略。

1. 立足新闻的情理逻辑,传递多元的健康知识

社会行动者对于日常世界的理解依赖于对共同知识的解释和共同规则的运用,即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动者假定其他人也拥有的知识。^{②4}故而新闻的知识生产既是对严肃科学知识的审慎阐释,也是对日常知识的廓清证实,需要根据新闻传播规律对知识进行符合共同规则的话语转换。健康知识与科学知识有着高度的重叠性,是一种系统化的专门知识,但相对于科学知识而言,健康知识含括同大众生活关联更密切的日常面向,兼具科学性、可证性和对现实的确认。因此,涉及健康议题的报道对记者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内容上,新闻记者需要不断扩充专业的医疗卫生知识库存,以辨别知识来源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挖掘知识形成的影响因素,剖析现象的背景和成因,向公众提供翔实有据的健康报道。二是在叙事上构筑新闻自身的情理逻辑,在坚守新闻理性的基础上合理发挥情感、伦理和美德等价值理性,积极倡导个体关怀与同理心的共振,吸引公众关注健康知识,增强健康知识传播的效果。

健康传播的知识生产在长篇报道上有充足的表现空间。例如,在《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报道慢性疼痛的健康新闻中,记者通过采访多位患者和医学专家,收集与疼痛相关的医学数据,陈明疼痛的症状、分类、原因、治疗方案与进展。^{②5}专业性较强的健康报道往往会涉及许多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这篇报道通过引用大量的医学研究成果和调查数据阐明背景知识,既提升了知识的易读性,也增强了知识的可信度。同时引入“讲故事”的方式,将采访对象的问诊经历作为叙事线索,通过个体叙事串联起知识结构,使得读者在与故事人物的情感共振中生发出对

健康知识的兴趣。

除了专业知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受教育水平等社会文化因素对健康传播效果的影响更为广泛而持久。记者的健康传播实践,也应该按照循证医学的思路,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查阅文献、多方验证,以保证健康知识的科学与权威。

2. 着眼社会的整体情境,建构平衡的叙事框架

如前所述,恐怖诉求应用于健康传播中收效甚微。建设性新闻的领军人乌尔里克·哈格鲁普因此呼吁,应制止因持续关注“坏消息”而引起的恐惧螺旋,打破焦虑的恶性循环。^{②6}建设性新闻所主张的平衡信息、正负情感的智慧正是对这一局限性的回应。记者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图谱,对事件和现象进行全面的观察,平衡地呈现健康议题中涉及的消极与积极的影响。

美国调查科学与健康记者、畅销书作家加里·陶伯斯在系列报道中对引起肥胖的诱因进行批判性思考。他对世卫组织提出的“卡路里摄入过多易导致肥胖”发表质疑,认为少吃多动的传统思维不足以解释如今居高不下的肥胖症发生率。他引用非营利组织“营养科学计划”(NuSI)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卡路里分为“坏的卡路里”和“好的卡路里”。其中碳水化合物属于“坏的卡路里”,是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的主要成因,而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属于“好的卡路里”。^{②7}加里的系列报道生动体现了健康新闻应有的思辨性,也融入了建设性新闻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原则,通过对惯常认知的批判性思考和严谨的验证性解释,理清误区,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策略,增益公众的自我效能感和改善健康状况的信念。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尤其在涉及专业知识的健康传播领域,对议题背景与相关事件的关联性思考,能够给人们判断其发展趋势提供参照,也体现了建设性新闻“解释新闻及背景”与“未来导向”的要素在健康传播知识维度的运用。例如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财新网于2020年1月20日发布题为《不明原因肺炎忽现》的深度报道,结合2003年的SARS病毒阐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原学检测进展和溯源难度,转述专家和官方立场回应“人传人可能性”问题,认为“中国的疾控系统正在面对一场意外考验”^{②8},发挥了新闻媒体监测环境、预警危机的社会功能。同时,微信联合腾讯健康、腾讯医典、腾讯新闻、腾讯地图等多个团队设置了“全国新

型肺炎疫情动态”专区,通过可视化的数据表格和疫情地图向公众呈现实时疫情动态、门诊导航和防护知识。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正面的情感安置与注入积极的情绪是改善新闻基调的驱动力。具有建设性的健康传播既要直面健康议题中的危机和风险等负向信息,也要在负面的事件中挖掘成长、恢复、希望等积极元素,通过透明完善的信息策展和正负平衡的叙事结构,在帮助公众感知潜在健康风险的同时,也恰切地减轻公众的恐慌、焦虑和无助。

3. 转变记者的角色定位,探索健康领域的共谋共建

健康传播通过汇集来自不同学科专业人员的知识交流,为健康行为提供有意义的支持。^②这种支持贴合了建设性新闻所强调的新闻“有为”,即以以一种更具吸引力、更具参与性的报道方式“适时地介入”。^③在这种价值驱动下,记者的角色定位得到扩展,他们不再仅仅是事件的记录员和社会运作的监督者,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和问题的解困者。新闻报道也不再仅是对现实的描述和对问题的批判,转而关注共谋与重建等代表蓬勃发展的主题,以探索解决之道的姿态参与报道流程,为公众提供卓有成效的行动指引。

一方面,记者可以充分利用职业便利调动多样化知识和资源,在科学评估方案效果的基础上阐述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新闻网站 Richland Source 在“治愈希望”系列报道中对导致婴儿意外死亡的原因进行调查,发现在俄亥俄州里奇兰郡,有安全隐患的睡眠方式是导致婴儿意外死亡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地人口普遍低收入和低学历的现状,报道中提出采用芬兰的安全睡眠传统为蓝本,使用婴儿箱(Baby Box)来促成更安全的睡眠。^④报道以解决方案为线索,不仅说明了既有蓝本的良好效果,而且引介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为降低婴儿死亡率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因此,在解决之道层面,健康传播要关注方案的效用和实施流程,以方案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吸引公众,为健康生活提供行动指南。

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中介力量,应当联结学者、卫生行业从业者、政府、公共组织和公众等在内的多方主体,创造多元合作的机会,促进方案、政策等的有效、高效制定和落实。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媒体除了发布相关权威信息,还通过对接医院、捐赠者和生产商,充当信息中间人的角色。

例如,“人民日报全媒体行动·征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求助者信息”平台发挥党报的资源优势,对接医患信息,实现供需信息的高效配对;《三联生活周刊》在疫情蔓延初期,立足平台优势,整合各地医疗信息,发起了“三联在行动”的活动,调配资源支援抗疫一线。媒体在健康领域公共事务中所展现出的专业认知力、问题识别力与高效的行动力,既体现了知识视野下的全局智慧,也展现了媒体通过适时的介入推进多方协作和行动实施的灵活性。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建设性新闻“赋权于民”与“协同合作”要素在健康传播的行为维度所发挥的作用。

四、结语

建设性新闻是传统回归与时代命题结合的创新。^⑤它在遵循新闻核心功能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平衡消极、旁观转向介入、方案代替冲突的建设性维度,实现对主流新闻理念和实践的纠偏补弊。尽管我国的传播语境与西方存在差异,对新闻建设性的理解 and 实践不尽相同,但在其强调新闻媒体对社会事务和社会变革积极的、适宜的介入上有着共通的价值取向。健康传播所谋求的“传递知识—转变信念—改善行为”基本模式切合了建设性新闻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试炼,建设性新闻在知识生产、方案转化的深度与广度追求也是修复健康传播缝隙的有益尝试。

另外,我们也要警惕建设性元素在健康传播中误用和滥用的风险,避免滑向过度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的极端。例如,虽然建设性新闻主张更具知识性的解决之道,但健康传播实践中的“软文广告”等形式,包裹着知识科普外衣,模糊了广告与新闻的界限,弱了解决方案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并不具有真正的建设性价值。同时,建设性要素不可能在同一篇新闻报道中全部体现,在健康传播中也并非全部适用。就协同创新而言,健康领域的科学属性造就了公众参与内容生产的天然区隔,因而现阶段难以实现健康领域“专家—媒体—公众”的深层次知识协作。如何打破这一局限,仍有探究的空间。此外,由于健康传播既包含关涉健康知识的生理议题,也囊括与社会关系相关的非生理议题,前文所论证的建设性新闻框架仅适用于健康传播的生理性议题,那么在诸如医患关系、医疗政策等更具社会性和公共性、更易被情感和权力裹挟的议题上,这种

创新范式如何发挥作用,也是建设性新闻在健康传播的实践上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注释

①白红义、张恬:《作为“创新”的建设性新闻:一个新兴议题的缘起与建构》,《中国出版》2020 年第 8 期。②⑥U. Haagerup. *Constructive News: How to Save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with Journalism of Tomorrow*.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8-19, p.23.③E. M. Rogers.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4, Vol.38, No.2, pp.208-214.④⑧胡百精:《健康传播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兼论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与解决方案》,《国际新闻界》2012 年第 6 期。⑤常江、田浩:《建设性新闻生产实践体系: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中国出版》2020 年第 8 期。⑥K. McIntyre, C. Gyldensted.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echniques to News P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2018, Vol.4, No.2, pp.20-34.⑦陈薇、王中宇:《智媒时代下建设性新闻的价值理性与实践路径》,《编辑之友》2020 年第 3 期。⑧殷乐:《建设性新闻:要素、关系与实践模式》,《当代传播》2020 年第 2 期。⑨L. Hermans, C. Gyldensted. 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udience Valuation. *Journalism*, 2019, Vol.20, No.4, pp.535-551.⑩L. B. Sillesen. Good News Is Good Business, But Not a Cure-all for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September 29, 2014, 1219 Words.⑪Robert E. Park.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0, Vol. 45, No.5, pp.669-686.⑫郑忠明、江作苏:《作为知识的新闻:知识特性和建构空间——重思新闻业的边界问题》,《国际新闻界》2016 年第 4 期。⑬⑰安·阮、曾听:《携手科学:作为知识型新闻的建设性新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增刊。⑭B. Takahashi, P. Parks. Journalists and Communicators' Perceptions of Their Graduate Training in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n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Based Journal-

ism Principles.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8, Vol.5, p.94.⑮W. Donsbach. Journalism as the New Knowledge Profession and Consequences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2014, Vol.15, No.6, pp. 661-677.⑯M. C. Nisbet, D. Fahy. The Need for Knowledge-Based Journalism in Politicized Science Debat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15, Vol.658, No.1, pp.223-234.⑰吴迪:《健康传播发展的三个理论维度》,《当代传播》2014 年第 4 期。⑱李月、薛云珍:《恐惧诉求在健康传播中的应用与展望》,《中国健康教育》2019 年第 11 期。⑲喻国明、潘佳宝、Gary Kreps:《健康传播研究常模:理论框架与学术逻辑——以“HINTS 中国”调研项目为例》,《编辑之友》2017 年第 11 期。⑳Yi Mou, Fuyuan Shen. (Potential) Patients Like Me: Testing the Effects of User-Generated Health Content on Social Medi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Vol.11, No.2, pp.186-201.㉑陈刚:《“不确定性”的沟通:“转基因论争”传播的议题竞争、话语秩序与媒介的知识再生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 年第 7 期。㉒黄旦:《导读:新闻与社会现实》, [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12 页。㉓李明子:《“痛”而为生》,《中国新闻周刊》2020 年第 30 期。㉔参见 Gary Taubes 个人网站中的系列文章, <http://garytaubes.com/works/>。㉕马丹萌、文思敏:《不明原因肺炎忽现》,《财新周刊》2020 年第 3 期。㉖R. N. Rimal, M. K. Lapinski. Why Health Communication is Important in Public Health.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Vol.87, p.247.㉗陈薇:《建设性新闻的“至善”与“公共善”》,《南京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0 期。㉘Healing Hope: A Nationally Recognized Series on Infant Mortality. https://www.richlandsource.com/solutions/healing-hope-a-nationally-recognized-series-on-infant-mortality/collection_98b2447e-9cc0-11e8-a31e-57c3a6116032.html, 2018 年 8 月 10 日。㉙许加彪、成倩:《建设性新闻的产制语境、理论蕴含与学理旨归》,《中国编辑》2020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沐 紫

Knowledge Vision and Solution Thinking: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en Wei Shi Ruixin

Abstract: In the "decentralized" communication context, health communication is faced with the plight of decreasing the authority of health knowledge, and also suffers from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ust capital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Based on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realizes the rigorous and dialectical balance of news paradigm by integrating multiple knowledge, and explores the solution of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to feasible solutions. This paradigm of journalism, combining knowledge vision and solution thinking, corresponds to the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mode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triple identity of knowledge builder, impetus motivator and action promoter,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esents multiple knowledge with rational logic, constructs complete narratives with dialectical balance and seeks co-construction with active intervention, which is a helpful attempt on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bstract: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knowledge-based journalism; health communication;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